

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作为他者的欧洲：欧洲文学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传播

*Europe as the Other:
A Study of Transporting European Literatures
in the 1930s Chinese Literature*

梅启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本书由“河南省社科联基础理论成果出版资助资金”资助出版

作为他者的欧洲：欧洲文学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传播

*Europe as the Other:
A Study of Transporting European Literatures
in the 1930s Chinese Literature*

梅启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他者的欧洲:欧洲文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传播/梅启波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
(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2-3699-3

I. 作… II. 梅…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欧洲—现代
IV. I 206.6 I 50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0502 号

作为他者的欧洲:欧洲文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传播
梅启波 著

责任编辑:彭理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200 千字		
开本:880 mm×1230 mm 1/32	印张:9	
版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0.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时至今日，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面对这种情势，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便有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形态和更为迫切的诸般任务。全球化和文化寻根的交错与碰撞，使我们既要警惕文化帝国主义那种单极文化的独霸，又必须深思如何遏止盲目自守、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对话与自我更新的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而在形成面向中西、古今的贯通视域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吸收和改造外来的文化和思想资源以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建设的有机成分，如何有效地将中国文学和文化推向世界以使之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以及如何在中外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来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等等，也都是亟需得到深入研究的课题；就此而言，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作为学科还是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某种选择，则不仅要能够针对具体课题以“发之微妙”，而且也应该在此过程中“充之周遍”，以便在疆域、问题和方法等的拓展中获致自身的持续发展。“华中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酝酿和出版，就是希望能以上述当代学术意识作为贯穿，努力建设一方可供思考和对话的学术平台，旧学新知，赏奇析疑，使相关研讨可以从容、深入地进行下去。

在华中师范大学，聚集着一批挚爱文学、坚持探索和思考的学人。1979年，我校《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率先登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论文。30多年来，我们这个群体与中国比较文学的建设一道见证成长。在长期的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中，师生们对很多问题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富有建设性的思考，所研讨的范围不仅包括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问题，而且力图立足于中国的文学现实，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生成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方法、我们的话语。这套丛书呈现的是近期研究的部分成果，其中有对我国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交流历史的探讨，有对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运用的轨迹的考察，还包括国外中国学研究和海外华裔文学的研究等等，问题探讨虽各有侧重，在比较中寻求贯通则是我们的共同之义。该丛书系列以后计划每年推出 1 至 2 本论著，以求教于同仁。

我们深知，比较文学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似乎构成了对人的智力的挑战，也唯其如此，比较文学才显得更有魅力。美国比较文学教授布洛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充满激情地说：“当前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任何领域都不会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恋。”在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人生苦短，学海无涯”这八个字有深深的体会。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之畔，滔滔江水不仅养育了我们，而且给了我们的思考和写作一种豪情，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极目楚天，云蒸霞蔚，我们希望“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成为一座沟通中外的桥梁，八方朋友在这里会聚，大家互相倾听，互相交流，享受思维的快乐，放飞心中的梦想。

胡亚敏

2008 年 2 月

序 言

启波从本科至博士阶段，一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我作为他的硕士和博士导师，可以说是看着他一步步成长和成熟的。启波为人机敏，好读书，更好思考，每次研究生们讨论问题，他总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是我最欣赏的地方。看到启波的这部书稿，回想起师生相处的那些日子，教学相长，析疑答难，颇多喜悦，也颇有些许感慨。在指导他的博士论文过程中，我们交流比较多，有时对他比较严厉。其实，我对他的博士论文是满意的，我觉得他不仅仅是在完成一篇论文，而是真正在思考和研究问题。现在，启波的博士论文亟待修改出版，作为导师，感到十分欣慰。

这本《作为他者的欧洲：欧洲文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传播》是在他硕士论文《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学对欧洲的接纳与变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扩展的结果。该书有它的特点，一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学有所发掘，提出和整理了一些过去被忽略的材料和问题；二是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上引入了现代传播学理论。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文坛十分活跃的时期，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革命与启蒙、激进与保守、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处于这个文化张力中的 30 年代中国文学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和研究。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些研究者对该时期的作家或流派有所论及，并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与“五四”时期和 40 年代文学相比，关于 30 年代的研究仍嫌不够

充分。就 30 年代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而言，较之中日、中俄文学关系，中国与欧洲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显得薄弱一些，特别是中国人的欧洲观念或者说中国文学中的欧洲形象鲜有涉及。因此，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学与欧洲之关系，研究这个特殊年代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进程的意义，正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中最早和最基本的范式，它与比较文学这个学科一样，也需要不断开放和发展自身。该书在充分占据资料的基础上，借鉴、吸取了 20 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传播学理论，并将之运用到中国与欧洲文学的关系研究之中，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考察欧洲文学在中国 30 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流传和变异，具体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过程特别是传播结果的研究，这一尝试可视为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范式的充实和发展。30 年代中国文学所展示的多样性的欧洲形象，一方面与欧洲文学本身的矛盾性和动态性有关，另一方面更多地折射出作为接受者的中国在特定时期对欧洲认识的多样性，特别是在吸收中的变异和异化。在书中，启波通过运用现代传播学的理论，并借助统计、考证等方法，能够在此多样性之中，具体揭示出欧洲文学作为一个“文化他者”是如何在中国 30 年代的文坛被接受乃至被“利用”的。

当然，该书所选取的作家多是直接留学欧洲或与欧洲文学有密切接触的人，其角度也是从中国接受者出发，探寻发送者的形象。必须承认，任何研究都是以对某些方面的盲视为代价的，作者对 30 年代作家在接受中的“创造性变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书中有些文字表述也可以再加磨练。不过，该书毕竟给我们提供了该时期一些重要的可供思考的东西，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我相信，启波将来一定会有更优秀的著作问世。

胡亚敏

2008 年 2 月

目 录

绪论 欧洲与中国	1
一、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学	2
二、何为“欧洲”	5
三、欧洲与中国	8
四、异国形象、他者和身份认同	16
五、影响研究与跨文化传播学	23
第一章 欧洲文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传播的主体和媒介 ...	29
第一节 传播主体的考察	30
一、20 世纪 30 年代留学欧洲的基本格局	30
二、留学欧洲的跨文化传播意义	60
第二节 中国对欧洲文学的译介	70
一、译介概况	71
二、译介的总体特征	83
第二章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欧洲形象	92
第一节 游记文学中的欧洲	93
一、晚清到“五四”游记文学中的欧洲	95
二、20 世纪 30 年代游记文学中的欧洲形象	103
三、欧洲形象背后的自我投影	115

第二节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小说中的欧洲	125
一、巴金《复仇》中的欧洲形象——他者与自我的混杂	126
二、从《二马》到《断魂枪》——老舍对自我东方主义的突破	142
第三章 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流变	163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综合化走向	164
一、现代主义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小说	165
二、从茅盾的《子夜》看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178
第二节 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民族化走向	186
一、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187
二、戴望舒诗歌的“欧化”与“民族化”	199
第四章 作为他者的欧洲	216
第一节 文化利用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学	217
一、欧洲人道主义在 30 年代中国的流变	220
二、启蒙理性在中国的工具化	240
第二节 文化利用与变异的原因探析	246
一、从“立人”到“立国”的感时忧国精神与民族主义的合流	247
二、对欧洲现代性的反思与本位文化身份的认同	251
三、深层的乡土文化推动	256
四、来自话语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压力	260
结语	268
参考文献	271
后记	278

绪论 欧洲与中国

传播是人的天性和文化特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化传播。从文化传播学的意义上讲，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文化传播、冲突、整合与发展的历史。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华文化和不同模式的外来文化的冲突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当佛教文化进入中国时，遭到中国本土道教和儒教文化的抵制，最后逐渐又融合发展。在漫长的历史中，欧洲与中国——地球上这两个相距遥远的文明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独立发展，其文化和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二者都是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异域世界，而正是这些差异性导致了两种文化相遇之后激烈的冲突，以及富有建设性的互识和交流。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伯把 17、18 世纪的欧洲称为“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各国在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和学习的热情总不是等量的。的确，在 1800 年以前，中国给予欧洲的比它从欧洲所获得的要多。但进入到 19 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天朝帝国的美梦被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这种关系逐渐颠倒过来，中欧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冲突由此开始。在这中欧文化交流的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欧洲文明大规模进入中国。在强势的欧洲文明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自身发展道路的重新认识和探索。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存在差异，但那种痛苦和焦虑的情绪是普遍的。他们激进地提出全盘西化，或趋向保守主义而盲目排外，而在二者之间徘徊煎熬者

亦有之。“五四”以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在看待欧洲和中国自身文化时缺乏理性认识，往往更多地看到中国文化的糟粕和占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的优点。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交流更加密切，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欧洲文化和本民族自身文化建设的呢？我们将从欧洲文学在 30 年代中国的传播这一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并希望藉此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

一、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学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高峰，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复杂的一个时期。当时就有人感慨：“目前中国的文坛，真是杂乱不堪！浪漫、颓废、趣味、幽默、普罗等等各种各样的什么都表现出来。无疑的，这正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多面性的表现。”^①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的研究者并没表现出这一时期多面性的特征，看法多简单化、模式化了。一种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是 20 世纪 40 年代初周扬为鲁迅艺术学院编撰的《中国文艺运动史》，再往后是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等，这些在政治化倾向方面走得更远。这种文学史观的局限性，简言之就是立足于“政治标准第一”的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倾向，这已为学界所共知，无需具论；另一种观点是来源于文化启蒙主义的认知系统。它作为政治性文学史观念的对立物，也是反拨性的价值重设，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并成为新时期主导性的文学观。其基本特点是将新文学的发展史设定在启蒙（文化）与救亡（政治）之间对峙与变奏的历史框架内（主要来自李泽厚的观点^②），以启蒙文化价值观对文学史现象进行重评。代表性著作作为 1987 年出版的，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合著的《中

① 〈杜〉任之：《争取民族的生存与文艺应有的动向》，载《文艺舞台》第 1 卷第 5、第 6 期合刊，1935 年 12 月。

② 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

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他们将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视为红色革命的 30 年代，从左翼作家、京派、海派、自由主义作家以及左翼作家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等方面进行考察。该书在《绪论》中明确宣示：“作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具有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将现代文学 30 年视为一个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的整体。从 90 年代到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趋势：一个是向前追溯，一个是向后延伸。关于中国文学向前追溯最早是海外的一批学者，有王德威、李欧梵等，如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现代文学研究向当代延伸的趋势更为明显，这最初是始于钱理群发起的解放区文学研究，接着从“现代”到“当代”的转折期也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如“‘十七年’文学研究”受到关注，《南方文坛》2004 年第 4 期发表了《20 世纪 40—50 年代文学“转折”研究笔谈》，赵园、钱理群、洪子诚、吴晓东、杨联芬、刘增杰等人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

总体来看，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被学界忽视了。其实 30 年代和“五四”时期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区别，李欧梵也对学界将 30 年代文学归入“五四”文学的范畴提出质疑，他认为，“30 年代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②。30 年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地位。30 年代中国文坛和思想界看似多元而兴旺，其实却潜伏了一系列悖论和矛盾性问题：从启蒙出发，走向新的蒙昧主义，所谓“智识即罪恶”；从知识分子自身出发，最后“毁灭”了知识分子；从个性出发，陷入更为严密的组织之中；从自由民主出发，被置于国家主义的铁掌

①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 页。

②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 年，第 248 页。

之下；从世界意识出发，又返回民族主义；从多元主义出发，却走向崇奉权威主义。这些问题是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学所必须面对的。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研究者多忽视了 30 年代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的关系。原因是：一方面，30 年代出国留学的人数没有像“五四”时期那么突然和迅猛增长，在文学和思想上受外国的影响也不似“五四”时期那么急风骤雨式的。所以在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上，30 年代远没有“五四”时期那么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在 30 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①。那么在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上，研究者也多关注左翼文艺与苏俄和日本的联系。但这些客观原因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和否定 30 年代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的关系。实际上，30 年代中国文学与欧洲的关系相当密切，它与欧洲文学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同步的。它对欧洲文学的接纳更加深广，而变异也更加明显突出。所以本书主要从 30 年代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关系史的角度来观照 30 年代文学的整体特点，特别是希望厘清欧洲文学在 30 年代与 20 年代中国的传播有何不同。而且我们知道，30 年代欧洲文学是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但 30 年代中国对欧洲在接受却是有所选择的，这与 20 年代对欧洲在接受情况完全不同，其背后有哪些因素在驱动和作用，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必须界定什么是“30 年代文学”。至今人们仍习惯于把“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分为三段，即三个“十年”时期（1917 年—1927 年；1927 年—1937 年；1937 年—1949 年）。应该承认，这种划分方法是有历史依据的。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形成及发展历程一直以一些标志性的

^① 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见《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85 页。

时间、事件来划分，而这些时间、事件主要是因政治内涵而获得命名历史的特权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宣言，它们宣告“结束”和“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就是以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变动而完成历史定格的。我们当然不是说文学可能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而发生和发展，而是说，文学是一种更复杂的人类精神行为和情感表达形式，它与历史及社会实践有着更深刻、更广泛、更多样的联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并不只是存在简单明了的决定关系，而更有可能是一种平等互动关系，并且有着更深层的历史动机把它们加以结合或分离。特别是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独立于世界而存在的，它与外国文学有着密切联系。正因为此，陈思和才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问题。以30年代文学而论，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独特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学发展的一环，所以我们划分文学阶段时也可以并不按照特定历史事件来划分。特别是当讨论的问题涉及影响与接受的问题时，实际上影响的效果很少是立竿见影的，它往往具有滞后性。而有些现象虽然出现在30年代，但要追溯其影响则可能在20年代或者更久远。所以为了避免将问题复杂化，我们探讨30年代的问题主要是按照物理时间来划分的，即指1930年—1939年的中国文学。

二、何为“欧洲”

何谓“欧洲”？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关于欧洲，地理学家可以告诉你在东半球的西北部，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南濒地中海北临北冰洋的这一地域即为欧洲；历史学家可能为你展开一幅从古罗马帝国到拿破仑帝国、从英国工业革命到欧洲一体化建设的长长的历史画卷；哲学家会为你列数黑格尔、康德等大师们的鸿篇巨制；音乐家则会使你耳边响起贝多芬雄壮的第五交响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真的很难用某一方面的专门学问来概括欧洲的概念。但毫无疑问，这些都属于欧洲概念的内涵。

古代欧洲是一个遥远而不确定的北方世界，尽管在史前时期就有人类居住，但这片土地在罗马帝国走向衰落时期还没有进入人类文明史，公元 7 世纪前的希腊人把他们北部未知的地域称为欧洲（虽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列出专章叙述欧洲，他首先提到了把世界划分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三个部分的说法，但他对欧洲地理上的认识还是不准确的）。而在中世纪，伊斯兰势力把基督教局限于欧洲才形成了欧洲，这时期，神圣皇帝查理大帝在公元 800 年被称为“可敬的欧洲首长”和“欧洲之父”。此后经过十字军东征，以及罗马和拜占庭的分裂，天主教和拜占庭的分裂，基督教的欧洲走向分裂。而现代的欧洲正产生于旧世界的失败（1453 年拜占庭的陷落）、新世界的发现（1492 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对宇宙的认识（哥白尼 1543 的《天体运行论》——“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这个时期正是欧洲工业化以及城市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各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明等各种活动频繁而激烈。在这种条件下，走向现代的欧洲形成一个巨大的历史漩涡，将世界都卷入其发展进程中。这时欧洲人越来越多地谈论“欧洲文明”，这是与欧洲的外部扩张同步的，欧洲在探索外部世界的同时越来越具有欧洲归属感。18 世纪哲学家常把欧洲人的堕落与“善良野蛮人”的质朴、与中国人的智慧相对照。19 世纪后，欧洲归属感更成为一种优越感了。1800 年左右出现“欧洲主义”，到 1830 年，“欧洲化”以动词出现，体现一种欧洲给世界贡献了最好文明的意识。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欧洲认识到自身地位的下降，欧洲也经历了自身文化认同的危机。从 16 世纪开始被束之高阁的欧洲一体化思想重新出炉，并形成新的欧洲意识，直至欧盟的成立，而当下“欧洲”这个词被更广泛地用来作为欧盟的代名词。因此“欧洲”不应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应被当作一种“文明概念”来看待。实际上，“欧洲”这个地理名词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也与我们的认识和政

治地图、经济、文化或实际考虑的变化有关。而当我们谈到西方时，历史地去理解它就是指以欧洲为发祥地的西方文明。也就是说，“欧洲”可以理解为西方历史文化、文明的一种载体。

当然，以狭义的文化概念来定义欧洲也是不足取的。说欧洲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人本主义的，都不确切。如让·巴迪斯特·迪罗赛尔所说：“当人们说欧洲是法治国家，我想到的是独裁专制；说欧洲是人类的尊严之乡，我想到种族主义；说欧洲是理性的国度，我想到浪漫主义的梦想。我在宾夕法尼亚能找到公正司法，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中找到人类尊严，在世界到处都有理性存在。正如笛卡尔所说，好的意愿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东西。”^①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别共殊”的哲学思想很能适用于欧洲研究。例如，欧洲一地集中了那么多历史文化同源异流的民族国家，这就有一个“别共殊”的问题。就是说要区别诸民族国家各自特有的“殊相”和它们之间的“共相”。明明是一个国家所特有，却把它看成是普遍的现象；或者明明是普遍的现象，却把它看成是某一国家的独有现象，都是偏颇的。那么，什么是欧洲文化特有的？有众多学者试图定义欧洲，但发现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欧洲生于各民族的混合杂烩，只有模糊的边界，如同一个多变的几何图形，不断发生断裂、变形。所以一般欧洲学学者认为，要拷问欧洲的概念只有努力从它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矛盾性中呈现其复杂特征。欧洲应该是一个躁动着的、动态的、相互矛盾的文化概念。欧洲如同一个多源且互相冲突的巨大的文化漩涡：宗教与理性、信仰与怀疑、神话与批判、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人道精神与科学文化、新与旧等相互激烈冲突。如法国学者莫兰所说：“欧洲文化是犹太—基督教—希腊—罗马四种文化的综合，这四种文化漩涡中又诞生了人本主义、

^① [法] 让·巴迪斯特·迪罗赛尔：《历史上的欧洲思想》，巴黎 Denoel 出版社，1965 年，第 73 页。

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些可以嵌入外部文化并对其发生影响和改变的文明现象。”^①

三、欧洲与中国

本书从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个角度切入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讨论中一般都用“西化”这个词，而且很多时候“西化”与“欧化”这两个词又混淆不分。实际上，“西化”、“西方”这类词涵盖太泛，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是一个泛指，而且这类词的使用存在本质主义的危险。萨伊德强调过他是反本质主义的，“我对一切如‘东方’、‘西方’这种分门别类的命名极为怀疑……像‘东方’、‘西方’这类并非实际存在的自然现象一样，是恒定的现实”^②。因为这种本质主义的立场显然不适宜于研究异质的、动态的、复杂的人类现实，同时任何强行将不同民族和文化划分为孤立的、不同种类与本质的企图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曲解和篡改。而相对“西方”这个概念来说，欧洲无论在时间上和地理空间上如何变换，都可以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经纬坐标。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欧洲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是欧洲发酵催生了所谓的西方世界，从而影响到东方和中国的。所以我们选取“欧洲”作为对象而不是“西方”这个泛化的概念。

另一方面，使用欧洲这个概念更能准确地反映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人对世界及欧洲认识的实际情况。中国人关于欧洲文化与文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是不全面的，至少相对于欧洲汗牛充栋的汉学研究著作来说，中国人对欧洲的记载和认识是远远不够充分的。但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 参见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等译，三联书店，2005 年，第 31 页。

^② [美] 爱德华·萨伊德：《东方不是东方——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唐建清、张建明译，载《文艺理论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78 页。